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夏史与夏代文明

李学勤 主编
孟世凯 副主编
詹子庆 著

一 在历史和传说之间跋涉
二 史籍中的吉光片羽
三 手铲释天书
四 夏族的起源
五 夏代兴亡
六 早期国家形态
七 夏代地域及其邦盟
八 华夏文明之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在历史和传说之间跋涉／1

一　代代相传的接力棒／1

二　不同角度的聚焦／9

2　史籍中的吉光片羽／19

一　《诗》《书》传诵／19

二　珍贵的记闻／24

三　夏世谱的流传／25

四　先秦诸子的夏史观／27

五　《夏小正》与夏历的瓜葛／32

六　“奇书”也有不奇处／33

七　司马迁的首功／40



3 手铲释天书／43

一 打开尘封的历史／43

二 古都郑州遗址的惊世发现／46

三 豫西调查记／47

四 热潮滚滚来／50

五 任重而道远／54

4 夏族的起源／61

一 鲧的传说／61

二 夏族探源／64

5 夏代兴亡／72

一 大禹事功／72

二 传子制的确立／96

三 甘之战／99



四　夷夏之争／104
五　少康中兴／112
六　孔甲乱夏／114
七　夏桀灭亡／115

6　早期国家形态／122
一　从族邦到王国／122
二　“夏后氏官百”／132
三　“天下共主”的地位／138
四　贵贱有等的社会结构／141
五　“夏礼吾能言之”／145

7　夏代地域及其邦盟／149
一　《禹贡》“九州”／150
二　王畿和中心统治区域／160



三　夏文化圈／165
四　方国林立／176

8　华夏文明之光／186
一　农业文明／189
二　青铜文明／192
三　玉石制造及其他／194
四　夏人的精神世界／202

参考文献／216
附　表／223
夏世系表／22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在历史和传说之间跋涉

一　代代相传的接力棒

一部夏史，始终纠缠在传说和信史的困惑之中，研究者们常常摇摆在历史和传说之间，时而打开了时空的隧道，时而又掩闭其门、另辟蹊径，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大家为了弄清夏史的真相，都艰难地向前跋涉着，逐步看到了夏史的曙光，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的考古成就，带给研究者们的则是更大的希望和信心。

夏史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夏史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先期阶段

清以前的资料整理阶段。每个民族都重视本民族的世系，先秦时代关于五帝传说和夏商周三代的世系应有不少传本。现存《世本》和《五帝德》、《帝系》可能就是这些传本的遗篇。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发现的魏国编年史《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夏史世系、纪年和重要事件，这是战国时代魏国学者整理夏史资料的重要成果。司马迁著《史记·夏本纪》是系统整理夏史资料和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功不可没。篇中记录夏世系和夏史大事、禹贡九州等内容，必有所本，不能轻易怀疑。

此后西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夏纪》,宋人罗泌撰《路史·后纪·夏后氏》,都是在《史记·夏本纪》基础上"博采经传杂书",使夏史资料进一步系统化,但所取资料多来自古文《尚书》和其他再生资料,且加以神化,故其资料学术价值未必像《史记·夏本纪》那么珍贵。

清学者马骕(1621—1673)撰《绎史·夏史》四卷,内容有:禹平水土、夏禹受禅、少康中兴、商汤灭夏。该书取材于唐以前典籍,搜罗殆尽,系统整理夏史资料,便于研究者览阅查验。然所收资料真伪不分,谶纬附会之文夹杂其中,且把岣嵝碑误认为夏碑更是大错,每段后所附作者评述,因受其史观所限,参考价值不大。

崔述(1740—1816),是近代以来疑古派的鼻祖,他著《考信录·夏考信录》两卷。这是一部挑战传统文献、在辨伪考信基础上试图建立可信的夏史系统的论著。书中表述他对夏史的总体看法是"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太康后中衰,"仲康微弱,后相失国,夏政不行于天下也"。其说大致不误。他对夏史资料中来源于"伪书"和汉儒的一些谬说做了用心辨正,试图揭开蒙在夏史上的面纱,给后来研究者以启示。不过,由于受时代和辨伪方法的某些局限,他不可能真正做到求真,其主观臆断之辞常溢于言表。

(二)"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古史辨"派的影响

在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几位史学大师举起几面大旗,现分述如下:第一位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1877—1927),他在1925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课而撰写了《古史新证》①。书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至为深远。其中有关夏史的论述,更为研究者奉为圭臬。现摘录如下几段以供品味: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各国之所同也。”

王国维一面主张要纠正“信古之过”;另一方面批评当时学术界存在着的“疑古之过”,他论述道:“乃拼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古史新证》,第 1—2 页)

《古史新证》第二章——禹,以春秋时代秦公敦(簋)和齐侯镈、钟铭文为证,肯定文献记录的禹其人其事并非虚妄之言。书中述道:“自《尧典》、《皋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他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古史新证》,第 4—6 页)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怀疑禹的说法持排斥态度。

王国维先生首先用甲骨文论证商史,发现于甲骨文上的商先公先王世系与《史记·殷本记》上的世系,“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最后,他提出对古书的一些看法:“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古史新证》,第 52—53 页)

显然,这些话都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出现的疑古思潮而有所发的,反映先生真乃独具慧眼,开了当时学术风气之先。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国学大师,他创立“古史辨”派,于 1923 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他对清理传统史学,批判封建道统,重新

构建古史体系，培养出一批史学大师，其功不可没。然顾先生受崔东壁等学者疑古思潮影响，后来证实他的某些观点有“疑古”过头之失。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先生本人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也不断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对夏史研究，主要观点有：

1. 他依据《说文》“禹”字解释，假设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后又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再后又认为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原为戎的宗神，随着九州、四岳的扩大演化为全土共戴的神禹，更演化为三代之首君。对于禹为动物说，他晚年仍坚持不变①。

2. 他与童书业合写的《鲧禹的传说》和自撰的《息壤考》，对鲧禹治水传说的演变，认为最早文献记载，禹是禹，夏是夏，两者毫无关系。把鲧禹说成父子，鲧与夏发生关系，始于战国时代成书的《国语》与《左传》，鲧禹治水用不同方法，也是出自战国文献的记载②。

3. 他与童书业合写的《夏史三论》，论述启和三康五观和羿浇的故事是后人编造的，是传说，不是夏代的史实③。

4. 顾先生不怀疑夏朝的存在，他依据文献，对夏的都城和疆域做了探索，并试图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来印证夏的存在。

李民认为顾先生的学术观点后来有变化，“他到了六七十年代不但承认有夏史，而且非常赞成古史与考古发掘相互结合”。并列举1974年顾先生写给他的信为证，信中说：“偃师一地之新发掘，据北大友人言，龙山文化之下层为仰韶文化，有规模颇伟之建筑遗址，说不定是夏代物。按此地在洛阳东，洛阳是夏桀所都，见于《逸周书·度邑》及《史记·吴起列传》。洛阳之西，即秦岭，《左传》所云：‘崤有二陵焉，其

①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第130—202页，中华书局，1988年。又参阅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夏文化研究文集》，第124—127页，中华书局，1996年。

② 同上书，第88—138、199—201页。

③ 同上书，第139—198页。

南陵，夏侯皋之墓也。’则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①]。”1979 年顾颉刚、刘起釪合写的《〈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明确表示了中国古代不但有夏，而且对夏的地理方位与周围诸小国的关系给予了深入研讨。

实际上，顾先生已接受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大概由于学术的发展，时势使然也。

郭沫若先生（1892—1978）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为纪念郭老诞辰百周年，李学勤先生曾撰文《郭沫若同志对夏代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论述到郭沫若的史学研究贡献：“郭沫若在甲骨文和殷商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早已为人所共知。实际上，郭沫若对于夏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也起过很重要的先驱作用。”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夏禹的问题》[②]一文的发表（1930 年）。本文为呼应顾颉刚的夏史观所做出的反响，文中对顾说有赞同之处，但也提出不同的见解，他表述如下：“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三）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与古匈奴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337 页）。显然他肯定夏代的存在，但在研究态度上，他引用胡适的话：“以山西为中心的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他赞同胡适这种“比较矜慎”的态度。

在研究方法上，郭沫若和王国维一样，用金文资料参证，他列举春秋时期的两篇金文，即齐侯镈、钟及钟铭和秦公簋铭。

齐侯镈、钟金文：“虩虩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则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先生的贡献在于从宋以来把“夏”字误释为“履”，

① 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第 99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0 年。

经过先生的解释把“翦伐夏后”与“处禹之堵”连贯起来,“则历来以禹为夏民族祖先之说,于金文上已得一证”。又举秦公簋金文:“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绩,十有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使蛮夏。”据此,郭老认为“上言‘禹绩’,下言‘夏’,则夏与禹确有关系。”郭沫若用金文物证来研究夏史,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应用。

另外,郭沫若还提出夏民族向北迁徙和夏与甲骨文土方的关系的看法,推测夏民族“有一部分系逃往南方”。以后,徐中舒、胡厚宣等诸位学者亦赞同此说,发表了相似的看法。

郭文结尾提出:“要之禹与夏就文献中所见者确有关系,此必为夏民族之传说人物,可无疑。又夏民族与匈奴族有近亲之关系,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于将来大规模的地下发掘,时可望得到实物上的证据。”后来在他撰写的《奴隶制时代》①一书中,认为夏代“顶多只能达到奴隶制的初期阶段”。在夏文化探索还没有开展的情况下,他始终认为“关于夏代的情形,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多说,且等待日后从地底下能有丰富的资料出现”。可见,先生对待夏史始终带着“比较矜慎”的态度。即使到了 1979 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问题已经提出,史学大师徐中舒先生仍然认为这是“夏史初曙”。如今夏文化探索已取得丰硕成果,有些问题逐渐露出水面,前辈们对夏代那种谨慎、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仍然是当今学者学习的榜样。

(三)夏文化的探索推动了夏史研究的蓬勃开展

徐旭生先生(1888—1976)是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影响深远(1943 年初版,1960 年增订本,文物出版社),书中第三章“洪水解”,列“大禹的治水”专节,对大禹治水的范围和方法进行了研究,肯定夏王国的存在,并为夏文化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先生逝世后,由助手黄石林先生整理其遗著《尧舜禹》发表(刊载于《文史》三十九辑和四十辑),该文对禹其人其事做了进一步论述。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6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徐旭生先生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在七旬高龄之年亲往洛阳、登封、偃师等豫西和晋南“夏墟”之地进行考古调查。尔后，二里头遗址、登封告成遗址及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就是在徐老踏察的启发下开始发掘的。

1978 年以后，随着夏文化探索热潮的兴起，夏史研究持续不断地深入开展。作为夏史研究的主力军，考古学家们探索夏文化、研究夏史的硕果累累，本书将有专章论及，而本节则主要介绍历史学家们参与研究夏史的情况。

徐中舒先生（1898—1991）较早把视线转向夏史研究，发表了《夏史初曙》一文（《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他认为“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夏史已见曙光”。为此，他提出应把重点放在夏史研究方面。徐老为拓展夏史研究思路，启发研究者去考虑，“至于夏王朝疆理所及，声教所及，到达些什么地方呢，这在旧文献中还有一些记录可供参考”。他还根据文献线索，认为成汤灭夏，促使夏民族大迁徙。他提出“夏商之际夏民族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南迁于江南为越”。“韦顾既伐”后，也都北迁，“韦即豕韦省称”，“豕韦北迁后又称室韦或失韦”。这些看法，在他后来撰著的《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 年）中继续得到阐发和丰富。

李学勤先生较早注意到夏文化问题。他在《新建设》1958 年第 8 期上发表了《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社会》（原题《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文中提出：“在郑州商族文化层与龙山文化层重叠时，其间每每夹有无文化遗物的土层，表明两者不相衔接。在洛达庙、南关外、旭旮王等地果然发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层，我们称之为‘南关外期’或‘洛达庙期’。它们更接近龙山文化，而有其特异点，如南关外期的棕色陶器、洛达庙期无鬲类空足器等。这两期都早于二里岗下期，最可能是夏代的。”这里讲的“洛达庙期”文化，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二里头文化。

后来，随着考古和古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针对国内外古史研究的现状，他提出“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

能的了”①。先生的这一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益表明他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研究的先导意义。

关于夏史研究，李学勤先生还发表了《〈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②和《郭沫若先生对夏代的研究》③等。前文肯定了《古本竹书纪年》从世系、事迹、都邑、年代等四方面证实夏史的史料价值，有“珍贵的内涵”，但同时也提出它受时代色彩和思想倾向的局限，我们对它也不能全信。而后文则肯定了郭老对夏史研究的先启作用。

刘起釪先生是顾颉刚先生的弟子之一，他协助顾先生晚年做《尚书》整理工作，并自撰《古史续辨》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书中有专篇研究《尚书·禹贡》和《甘誓》中的疑难问题，且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还对夏族原居地进行了缜密考证，提出夏文化始于晋南说。刘先生的作品继承了“古史辨”学派的文脉。

李民先生是当代研究夏史的史学专家之一，他著《尚书与古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和《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两书中运用《尚书·虞夏书》文献来研究夏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郑杰祥先生是研究夏史和夏文化成果颇丰的专家之一，他因亲自参加过夏文化考古发掘，又熟悉夏史有关文献资料，已有多部论著发表。他的《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是我国第一部有分量的系统研究夏史和夏文化的专著。该书分夏代历史简论和夏代文化探索两部分。内容翔实，其中不乏许多独到见解，对夏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另外，郑先生的新著《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也已面世，这是一项把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联系起来考察的新成果。

最后不能不提孟世凯先生的《夏商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和孙淼先生的《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 年）。前书通俗生动、雅俗共赏，又不失其学术性，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 19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② 《〈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收入《华夏文明》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③ 《郭沫若先生对夏代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在面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后书的上篇夏代史，占236页，分量不轻。该书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夏史和夏文化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见解，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同时可作为历史考古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的自学教材。

另外，与夏史有关的研究专著还有：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梁颖、李庭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与形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张广志、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白钢主编、王宇信、杨升南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二卷《先秦》（人民出版社，1996年），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姚政《先秦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等。上述专著中夏史内容占相当部分。他们都为推动夏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目前，夏史研究仍是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不过，由于夏文化探索尚未有突破性进展，因此，学术界对夏史的迷茫状态恐一时难以驱散。不过，有目共睹，商史研究经过100多年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齐心协力，执著追求，取得了可喜可贺的百年辉煌成就，为夏史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借鉴。大家期盼着夏史和夏文化研究也能有这样一个转机的到来。

二　不同角度的聚焦

（一）夏代历史是信史，还是传说、神话

对于夏代，本来没有人怀疑它的存在。众所周知，古文献上的“三代”，从来是夏商周连称的。但是，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曾一

度怀疑过它的存在。但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承认夏朝的存在,不过他还是坚持禹是动物、禹是夏人宗神、禹夏关系是后人硬加上的等说法。

顾先生的观点影响很大,尤其对国外影响更大。国外部分学者认为夏文字尚未发现,因此对夏只能作为传说,不能作为信史看待。艾兰(英)认为:"那些从黄帝到夏代的历史记载,都可以看作是从商代神话体系中演变发展而来的。"基于这一认识,进而推导认为:"如果'夏'原来是一个神话,后来被变成了'历史',那么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也就难于成立了①。"

1999年5月22—26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无论是来自大陆或来自台湾,以及外籍华裔学者都肯定夏代的存在,仅有少数几位外国汉学家怀疑夏的存在,一位是艾兰(英)提交的论文:《有无夏?历史方法论问题》,坚持认为没有夏代;另一位是刘克甫(俄罗斯)提交的论文:《夏国家:现实或神话》,认为有关夏代的记载都是后人伪托的神话,夏代不是现实,主要理由是没有发现夏文字②。

夏代的存在与否本来是不成其问题的问题,而是近代疑古思潮引来的风波。后来"古史辨"派纠正了自己的观点,而其影响余波至今没有完全平息。现已有足够证据表明夏代的存在不容置疑。

上面提到古代文献从来是"三代"夏商周连称。由于《史记·殷本纪》商先公先王世系得到甲骨文的证实,大大增加了《史记·夏本纪》夏王世系的可信度。

50多年夏文化探索基本确认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夏"字在金文中早被学者识读,甲骨文中是否有"夏"字,也有学者提供了文字线索。至于夏代是否有文字,可能只是个时机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暂时没有发现夏文字而否定夏代的存在。

---

① 艾兰:《关于"夏"的神话》,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夏商文明研究》,第1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② 王宇信:《美国"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侧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

（二）夏代纪年

文献所见夏代纪年大致有两说：一说471年。来自《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另一说431年（或432年）。来自《易纬·稽览图》、《世经》（《汉书·律历志》引）、《帝王世纪》。或有"夏年多殷"（出自《晋书·束晳传》）说，此说不足为凭。

建国后中国历史教材和专著中的夏纪年一般采用前21世纪—前16世纪。

1996年国家科技部组织专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年代的预期目标，要求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14}C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①。"

"断代工程"专家组的工作步骤，首先确定武王克商年，即周始年为前1046年。然后参考和综合诸家有关商积年的几种说法，从已知周始年向前推算，再参考^{14}C测年数据，暂估定商始年为前1600年，也即夏亡之年。参考文献所见夏积年，向前推471年，则夏始年为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14}C测定的前2132—前2030年）范围内，现暂以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因此，"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夏年表框架确定为前2070年—前1600年。此年表比过去用的前21世纪—前16世纪略前进一步。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夏纪年当以《世经》提出的432年为正确的②。

（三）夏族的起源③

主要有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地区说和四川说。

---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74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② 程平山：《夏代纪年考》，《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本文认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年（471年说）是自大禹任夏伯之年始，而《世经》记载的夏年（432年说）是自大禹即帝位之年算起，再依据文献资料对夏王在位年代做了推算，相加的结果得出结论，认为《世经》的432年说是正确的。

③ 参考张国硕：《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0期。

豫西说是主流，本书赞同此说。文献依据是：《逸周书·度邑》（《史记·周本纪》同）："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是指伊水、洛水之间。另外，依据文献"禹居阳城"、"禹居阳翟"说，前者考证为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这里发现王城岗遗址，出土印上"阳城仓器"戳记的陶器），而后者考证为今河南禹州市。考古学家认为：豫西一带分布着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它们都是属于夏文化性质。

晋南说呼声也很高。他们认为禹居阳城的地望在晋南，不在豫西。

宋罗泌《路史》卷十二认为，禹居阳城"乃泽之阳城"，即泽州（今晋城）阳城。丁山认为"阳城故名曰唐城"，又曰："谓唐城在冀城西者较确。"《世本》记载禹又都平阳、安邑、晋阳等地，皆山西境内。

今人刘起釪认为"夏"是冀州之人，冀州的原始地境在晋南，故称之为"夏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与此正吻合①。王克林考证：《国语·周语上》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的"崇山"不是嵩山，而是襄汾东南的塔儿山②。

山东说和古河济之间说。前说认为夏朝建立前的中心活动区域不在中原，而是在山东的黄河下游和海岱之间，他们考证与夏族关系密切的斟寻地望在今潍坊一带，另一支斟灌的地望在今山东寿光一带。古河济之间说，是指以今河南濮阳为中心的豫东、鲁西之间。此意见排斥夏族起源豫西、晋南说，对"阳城"、"崇山"、"夏墟"等传统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夏族兴起和中心活动地区应"转向'东土'为好"，他们提出"探讨夏文化的重点不应当放到豫西或晋南地区而应当放到以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③。因为他们的文章对夏文化探索的已有成果持之他论，故难以

① 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收入《古史续辨》，第132—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② 王克林：《中国古代文明与龙山文化》，收入《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③ 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